

魏晋公府从事中郎考述

刘军

(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 吉林长春, 130012)

摘要: 魏晋时期, 诸公及位从公的统兵幕府专设从事中郎一职。魏晋公府的从事中郎不再是以皇帝私属家臣身份督军的耳目, 而是府君信赖的心腹僚属, 与长官维持紧密的附庸关系。其地位介于长史、司马和参军、掾吏之间, 作为高级行政助理, 有权过问本府咨议、机要、人事、指挥、法宪等事务, 并可全权代表府主办事, 乃幕府纲纪显职。从事中郎的选任资格与乡品三品固定搭配, 阀阅世资以高门士族为主, 兼采优秀寒素。其仕宦履历不乏专属乡品二品的清要职位, 晋升过程相互衔接司空见惯, 反映当时门阀大幕虽已拉开, 但对流孔道尚未完全封闭。从事中郎仕途的末段普遍跻身三品官, 反证乡品对仕宦前景具有等位的预期功能。中正主观评议的乡品不同于单纯核算世资的门品, 这是研究从事中郎及其他职官必须加以细致区分的。

关键词: 魏晋; 幕府; 从事中郎; 流品秩序; 阀阅世资; 乡品

中图分类号: K2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24)03-0201-12

魏晋官制的显著变化之一是长官幕府的急剧膨胀, 上至位极人臣的诸公, 下到一定级别的将军, 都有开府置佐的资格。各级幕府的人员标配是长史、司马和诸曹参军、掾吏, 唯一品的诸公及位从公待遇特殊, 可专设“从事中郎”一职。从事中郎的地位介于长史、司马与参军、掾吏之间, 乃辅佐府君、赞襄政务的纲纪要职, 对幕府的组织运作起到难以替代的作用。作为研究对象, 从事中郎本身蕴藏着丰富的信息, 它由皇帝私属向府君亲信的身份转化, 与特定乡品门第的关联搭配, 以及迁转过程的共性特征, 皆是透视魏晋官僚政体和门阀士族制度的有效窗口。学界于此已有颇多建树^①, 但仅将其作为探讨乡品与官品、官职照应关系的例证而已, 缺乏起码的专门性和系统性。鉴于此, 笔者试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 对魏晋公府从事中郎的建制、职权、选任、调转进行全面探讨, 并将论述置于门阀化的时代背景下, 以期获得异于常规职官研究的新论断, 进而为后续课题的展开奠定基础。为方便资料检

索, 兹拟“魏晋公府从事中郎一览表”(见表1)缀于文末。

一、魏晋公府从事中郎的建制及职务属性

长官幕府设置从事中郎始于西汉。据学者考证, 《汉书·陈汤传》:“大将军(王)凤奏以为从事中郎, 莫府事壹决于汤。”即为明确例证^{[1](49)}。东汉固定为常制, 《续汉书·百官志》述将军府:“长史、司马皆一人, 千石。从事中郎二人, 六百石。掾属二十九人。令史及御属三十一人。”^{[2](3564)}不过, 两汉仅中朝将军府设从事中郎, 三公府却未置。魏晋在此基础上大大扩展, 史载晋制:“诸公及开府位从公加兵者, 增置司马一人, 秩千石; 从事中郎二人, 秩比千石……诸公及开府位从公为持节都督, 增参军为六人, 长史、司马、从事中郎、主簿、记室督、祭酒、掾属、舍人如常加

收稿日期: 2023-12-09; 修回日期: 2024-04-04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古鲜卑拓跋氏土族化进程研究”(19BZS056)

作者简介: 刘军, 男, 辽宁抚顺人, 历史学博士, 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魏晋南北朝史, 联系邮箱: chzl1979@126.com

兵公制。”^{[3](727)}诸公及开府位从公领兵者皆可置从事中郎,该范围须加细致说明。

首先,“诸公”乃三师(太宰、太傅、太保)、二大(大司马、大将军)、三公或三司(太尉、司徒、司空)的合称,特设的丞相或相国亦在其列。其次,“开府位从公加兵者”是独立的名号。这里所谓“开府”,并非通常意义的开设幕府,而是与“仪同三司”固定搭配,即比照三公标准开府的狭义用法^[4]。《晋书》卷二四《职官志》载:“骠骑、车骑、卫将军、伏波、抚军、都护、镇军、中军、四征、四镇、龙骧、典军、上军、辅国等大将军,左右光禄、光禄三大夫,开府者皆为位从公。”^{[3](726)}只有戎秩序列的诸大将军和文散系统的光禄三大夫可加开府仪同三司衔,进而获得“位从公”的地位。《宋书》卷三九《百官志上》存异说:“晋江右伏波、辅国将军,并加大而仪同三司。江左以来,将军则中、镇、抚、四镇以上或加大,余官则左右光禄大夫以上并得仪同三司,自此以下不得也。”^②意即江右开府仪同三司仅授诸大将军,江左放宽至四镇以上不加大的将军和光禄大夫^③。此处的“江右”与“江左”是以统治中心的地理位置代指历史时期,约略以琅琊王司马睿坐镇安东府为界。这些职位加授开府仪同三司后进位至一品,享受准公的礼遇。而准公欲配置从事中郎,还要满足“加兵”或“持节都督”的附加条件,《晋书》与《宋书》对此的记载略同,要求是相当严格的。

就制度的实际情况来看,据文末表1显示,以司马睿主政东南为界,此前的江右时代存录从事中郎43例,其中丞相、相国府5例,三师府4例,二大府12例,三公府9例,诸大将军府3例,不加大的将军府10例;此后的江左时代存录从事中郎37例,其中丞相、相国府10例,三师府1例,二大府8例,三公府8例,诸大将军府7例,不加大的将军府3例。由此可知,无论哪个时期,诸公及诸大将军都是配置从事中郎的绝对主体,不加大的将军占比微弱,光禄大夫完全没有实例;不加大的将军江右时期既已配置从事中郎,其跻身准公行列绝非始于江左;配置从事中郎的不加大的将军几乎都在四镇之上,四镇以下者仅见王义平北将军之孤证,似为个案特

例。因此,以从事中郎的设置权为参照,《晋书》《宋书》关于“开府位从公”的记述皆有修正之余地。另外,位从公尚须领兵才设从事中郎,表1中的司马昭、司马腾、司马睿、司马虓、羊祜、桓温等皆为手握重兵的实权人物;光禄大夫开府位从公,由于文散属性无法领兵而失之交臂。正因为达标条件严格,从事中郎成为幕府等级的象征,权臣当政屡屡强迫朝廷予以增置。例如,王敦“帝愈忌惮之,俄加敦羽葆鼓吹,增从事中郎”^{[3](2557)};谢安“欲混一文轨,上疏求自北征……加黄钺,其本官悉如故,置从事中郎二人”^{[3](2075)}。辅弼重臣致仕,保留从事中郎则表示皇帝的格外恩典^{[3](1059)}。总之,魏晋诸公及四镇以上加开府仪同三司之准公领兵者的幕府才能设置从事中郎。反之,幕府设置从事中郎成为锁定诸公及开府位从公身份的外部标记。

既已明确从事中郎的设置标准,还要厘清其职务属性与身份特质。清人王先谦《汉书补注》卷七七《毋将隆传》引姚鼐曰:“从事中郎,幕府之官,自汉至六朝皆有之,始见此传。案中郎本天子之卫臣,以卫臣而从事公卿之幕府,故曰从事中郎。”^{[5](1408)}此说甚是。从事中郎的本质首先是皇帝的“中郎”,其隶属九卿之一的光禄勋,与议郎、侍郎、郎中共同构成御前侍从系统。郎卫迥异于普通朝官,乃皇帝利用私人恩德之“任侠”纽带笼络的私属家臣,性质与庶子、舍人、中涓、谒者类似,故而作为皇帝心腹着重培养、考验,成为帝国预备官僚的养成所和储才库,皇帝委派郎卫至各官署挂职锻炼,名为“从事”“给事”“参事”,实则安插眼线收监控之效^{[6](173-203)}。前引西汉陈汤,起家太官献食丞,后荐举为郎,系皇帝私臣无疑,从事王凤大将军幕府实乃牵制外戚之举。此种手段自两汉延续至魏晋,《荀岳墓志》载:“大康元年十二月举秀才,二年正月廿日被戊戌诏书除中郎……七年七月十七日丁卯疾病去职,被壬申诏书除中郎……(十年)十二月廿七日除中郎参平南将军楚王军事。永熙元年九月除参镇南将军军事。”^{[7](11)}此处“参某军事”等同“从事”“给事”^④,且以“除授”而非“辟授”的方式任命,中郎荀岳显系皇帝派驻军府的全权代表,无疑是类似从事中郎的职务,其出身明确

为“中郎”，二者之间的关系不言而喻。

不过，伴随门阀政治的崛起，皇权日渐衰颓。光禄勋麾下的郎卫系统风光不再，取而代之的是凭借家世门第上位的黄门散骑。官居八品的中郎沦为冗散虚职，通常安排次等门第初仕时担任，特别是充当秀孝入围者的释褐起家官^{[8](89)}。因其无甚权势，仕途前景堪忧，从事公府的道路彻底阻绝，查文末表1，魏晋的从事中郎竟无一人出身中郎。而作为公府纲纪上佐的从事中郎就此与御前郎卫脱钩，由皇帝随机差遣的耳目变成附庸长官的固定僚属。相应地，从事中郎的任命逐渐由单一途径的“除”“拜”“转”“迁”变为涵盖“辟”“召”“命”“引”“请”的复合方式。表1显示，“辟”“召”“命”各有4例，“引”有9例，“请”有6例，合计27例，比重相当可观，反映出从事中郎演变的新动向。这些语词都是“辟授”的意思，即长官靠情谊关系私人邀约，与朝廷正式委任的“除授”大相径庭。虽同为编制内的国家公职人员，但前者主要对府主负责，后者竭诚向皇帝效忠。从事中郎同府主基于举荐与被举荐的恩义媒介形成强烈的封建依附关系，履行连带的责任和义务，是谓“君臣之义”，这层关系日后不会因双方地位的逆转而改变，也不会因一方逝世而消除，从而凝结为牢固的利益共同体^⑤。这是从事中郎备受长官青睐，视为心腹且委以重任的原因。

二、魏晋公府从事中郎的职责权限

如前所述，汉晋之际，公府从事中郎的身份属性发生根本转变，即由皇帝家臣变成长官属僚，职责权限亦随之调整。起初，从事中郎仅有谋议之权，这是自西汉以来的传统惯例^{[1](149)}。《续汉书·百官志》本注明言：“职参谋议。”^{[2](3564)}实则利用参赞军机之便监督主官，随时奏报皇帝。但当它脱离皇权后，便只能对府主俯首帖耳，协同其他僚佐，共同应对幕府事务，职权范围不断扩大。司马睿镇东及丞相府，从事中郎甚至一度“分掌诸曹，有录事中郎、度支中郎、三兵中郎”^{[9](1223)}。可见，从事中郎经历了由单纯谋议

岗位向综合性参事职务的转变。

首先，从事中郎的随侍、参议职权不废，谏诤、谈论不绝史乘。史载，荆州都督、镇南大将军、新野王司马歆镇压江夏张昌叛乱久不出兵，从事中郎孙洵谏曰：“古人有言，一日纵敌，数世之患。公荷藩屏之任，居推毂之重，拜表辄行，有何不可！而使奸凶滋蔓，祸衅不测，岂维翰王室，镇静方夏之谓乎！”^{[3](1126)}阮籍“引为大将军(司马昭)从事中郎。有司言有子杀母者，籍曰：‘嘻！杀父乃可，至杀母乎！’坐者怪其失言。帝曰：‘杀父，天下之极恶，而以为可乎？’籍曰：‘禽兽知母而不知父，杀父，禽兽之类也。杀母，禽兽之不若。’众乃悦服”^{[3](1360)}。可见，从事中郎的发言权能够得到充分尊重。从事中郎陪伴府主，亦有文化层面的沟通交流。史载：“(征南大将军羊祜)乐山水，每风景，必造岷山，置酒言咏，终日不倦。尝慨然叹息，顾谓从事中郎邹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贤达胜士，登此远望，如我与卿者多矣！皆湮灭无闻，使人悲伤。如百岁后有知，魂魄犹应登此也。’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闻令望，必与此山俱传。至若湛辈，乃当如公言耳。’”^{[3](1020)}显系阿谀之词。又谢万任抚军大将军、会稽王司马昱从事中郎，“著白纶巾，鹤氅裘，履版而前。既见，与帝共谈移日。”^{[3](2086)}宾主推心置腹，尽显名士风范。

其次，从事中郎还执掌文书、机要。史载：“(孙惠)复请补司空(东海王司马越)从事中郎。越诛周穆等，夜召参军王廙造表，廙战惧，坏数纸不成。时惠不在，越叹曰：‘孙中郎在，表久就矣。’”^{[3](1884)}孙惠曾任司马越记室参军，凭文才深得器重。又镇东参军诸葛恢“与卞壺并以时誉迁从事中郎，兼统记室。时四方多务，笺疏殷积，恢斟酌酬答，咸称折中”^{[3](2042)}。从事中郎主管记室渐成惯例，连带负责机要。例如，荀勖“转(大将军司马昭)从事中郎，领记室……与裴秀、羊祜共管机密。时将发使聘吴，并遣当时文士作书与孙皓，帝用勖所作。皓既报命和亲，帝谓勖曰：‘君前作书，使吴思顺，胜十万之众也。’”^{[3](1152-1153)}又羊祜“拜相国从事中郎，与荀勖共掌机密”^{[3](1014)}。从事中郎无疑居于核心决策圈。

再次,从事中郎有权过问组织人事。史载魏晋府僚的基本分工:“长史、从事中郎主吏,司马主将,主簿、祭酒、舍人主阁内事,参军、掾、属、令史主诸曹事。”^{[9](1223)}从事中郎掌选的事例如琅琊王司马睿丞相掾祖约,“与陈留阮孚齐名。后转从事中郎,典选举。”^{[3](2626)}另卞壶“元帝镇建邺,召为从事中郎,委以选举,甚见亲杖”^{[3](1867)}。司马睿主政东南,丞相从事中郎祖约、卞壶负责军政人员的铨叙。平素主要向府主荐举人才。史载:“(胡毋)辅之时为太傅(司马)越从事中郎,荐(光)逸于越,越以门寒而不召。越后因闲宴,责辅之无所举荐。辅之曰:‘前举光逸,公以非世家不召,非不举也。’越即辟焉。”^{[3](1384)}再有“安东从事中郎诸葛恢、参军庾亮等荐(虞)预,召为丞相行参军兼记室”^{[3](2144)}。此乃司马睿安东府升格为丞相府时事,亦可向其他幕府保举低级掾吏。史载:“镇东从事中郎张闳举(戴)洋为丞相令史。”^{[3](2470)}“令史”属寒素担任的胥吏,乃官厅中的基层办事文员,入职须引荐担保。从事中郎是有此资格的。

复次,从事中郎可介入军事行动。一方面接受府主差遣领兵。史载:“(晋惠帝)以成都王颖为丞相。颖遣从事中郎成夔等以兵五万屯十二城门,殿中宿所忌者,颖皆杀之,以三部兵代宿卫。”^{[3](102)}此乃宫廷政变,从事中郎的立场向背不言而喻。另一方面代表府主督军。史载:“帝(司马昭)奉天子西征,次于长安。是时魏诸王侯悉在邺城,命从事中郎山涛行军司事,镇于邺。”^{[3](43)}所谓“军司”,是派驻征讨军的督军使者,原本是皇帝的耳目,却因司马昭挟天子,才改换本府从事中郎兼任,此安排必源自其系统内自监督权力的变相延伸。值得注意的是,从事中郎的军事活动必须听命府主。史载,大将军王敦从事中郎顾众指挥方面,“径之鄱阳,不过敦,敦甚怪焉。及敦构逆,令众出军,众迟回不发。敦大怒,以军期召众还,诘之,声色甚厉。”^{[3](2016)}顾众特情下抗命遭斥,反证平素唯命是从。

最后,从事中郎在府内还有针对下级吏员的制裁权。史载,主刑宪的丞相司直刘隗举奏本府擅杀督运令史淳于伯案:“谨按从事中郎周莛、法曹参军刘胤、属李匡幸荷殊宠,并登列曹,当

思敦奉政道,详法慎杀,使兆庶无枉,人不称诉。而令伯枉同周青,冤魂哭于幽都,诉灵恨于黄泉,嗟叹甚于相梁,血妖过于崩城,故有陨霜之人,夜哭之鬼。”^{[3](1837)}此例,从事中郎与专司刑罚的法曹参军联手制造冤案,足证其具有一定的执纪权。

总体而言,从事中郎拥有顾问咨议、文案机要、吏员荐举、统军督军、执纪刑宪五项基本权力,且能获得府主的充分任用。它与分曹办事的参军、掾吏截然不同,乃统筹幕府全局的关键人物。特别是从事中郎常被委以腹心之事,充当府主外联的全权代表。例如,坐镇并州的刘琨联络东晋,辞让官职,“前后章表,具陈诚款。寻令从事中郎臣续澹以章绶节传奉还本朝。”^{[3](1688)}再有拓跋酋豪沙漠汗及妻封氏改葬,晋成都王司马颖即遣从事中郎田思参加祭吊^{[10](6)}。从事中郎的品级禄秩与长史、司马平齐,皆六品千石,视之为清要显职毫不过分。若以长史、司马为主持公府日常工作的正、副秘书长,从事中郎则是最高的行政助理。三职联席并立,领衔府僚。史载,恒温、玄父子专擅朝政,皆“置左右长史、司马、从事中郎四人”^{[3](2575,2590)}。可见,从事中郎与长史、司马并为幕府纲纪。晋干宝《司徒仪》有云:“从事中郎之职,各当其所治之曹而纲纪其事,维正大体,恭参谋议。”^{[11](279)}就史实而论,所言不虚。

三、魏晋公府从事中郎的门等与乡品

众所周知,中国中世是门阀士族主宰的时代,士族因素决定了当时的政治制度、经济结构、社会面貌乃至意识形态^{[12](1)}。累积父祖官爵生成的“家世门第”是资源配置的基准,使不同出身者彝伦攸叙、安分守己的“清浊流品”是社会运行的守则。就当时的身份等级来看,曾祖以降三代世资五品官乃士族的入围底限,世资六、七品官属于寒士,世资八、九品官乃至府史胥徒属于寒人。寒士与寒人合称寒素,与士族之间有着难以逾越的鸿沟;士族内部约略以三品官为界,其上系一流高门,其下为一般高门,二者之间亦矗

立着森严的壁垒^⑥。官位及附属的仕宦资格乡品作为全社会最优质的资源自然要按族门高下严格分派，于是塑造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固化局面。西晋重臣卫瓘评价这种选官体制：“其始造也，乡邑清议，不拘爵位，褒贬所加，足为劝励，犹有乡论余风。中间渐染，遂计资定品，使天下观望，唯以居位为贵。”^{[3](1058)}文中“计资定品”道破了问题的关键，“资”是家族的官资背景，“品”是朝廷授予的乡品及相应的官阶，简言之，就是访第取士。

不过，衡量身份等第除此门资外，尚有所谓“乡品”。后者在前者基础上又包含中正代表乡党舆论对其德行、才学的主观评价^{[13](102)}。从总体趋势来看，乡品中德才之后天要素必为门资之先天条件所覆盖，毕竟聚拢优质资源的高门第本身就意味着文化氛围的高品位和人才培养的高质量，乡品自然而然地蜕变为纯粹的“门品”或“资品”。相应地，中正评议的空间被不断挤压直至丧失殆尽，最终退出历史舞台^{[8](129)}。然而，处于门阀社会初期的魏晋，阶级对流的大门尚未完全关闭，在门资发挥决定作用的同时，也为优秀的奋斗者留有余地。在此情况下，乡品就未必与门品合流，微末出身者还有跻身上品、改换门庭的契机，而且乡品并非恒定不动，会因各种变故随时调整。表1中不乏孤贫寒微却凭优异表现逆袭者，如郑冲“卓尔立操”^{[3](991)}，山涛“介然不群”^{[3](1223)}，郗诜“瑰伟倜傥”^{[3](1439)}，熊远“少有志尚”^{[3](1884)}，王长文“才学知名”^{[3](2138)}，续咸“履道贞素”^{[3](2355)}，范粲“高亮贞正”^{[3](2431)}。史籍中的这些描述或许依据中正所下品状，表明才德尚能左右乡品评定。

魏晋时期，在门第决定仕途的大前提下，不妨碍乡品与官职的对标，每一种官职都对候选者的乡品提出相应的要求^{[14](112)}。升官升品、降品降官成为官场通行的游戏规则。时人对此心知肚明，修史常事不书；降至后世，这些不书的常事却最令人困扰。本文探讨的从事中郎则是相关信息保全完整的珍稀素材。唐虞世南编撰的类书《北堂书钞》卷六八引《镇东大将军司马卬表》：“从事中郎缺，用第三品。中散大夫河内山简，

清精履正，才识通济，品仪第三也。”^⑦意即从事中郎例选乡品三品之人。那么，乡品三品属于何种层位，与阀阅世资又存在怎样的关系呢？这是笔者着重思考的问题。

文末表1共搜集魏晋从事中郎72人80例，其家世出身与仕宦履历清晰完整，为我们深入探讨提供了极大便利。首先，他们的乡品在正史各本传中毫无记载，只能通过释褐起家官加以推断。72人中60人起家官明确：4人六品入仕，占比7%；52人七品入仕，占比86%；4人八品入仕，占比7%。表明七品是从事中郎仕进的正常起点。这里不妨借鉴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关于乡品与起家官品对应关系的成果，他指出：“获得乡品二、三品者，可以从六、七品的上士身份起家。其次，获得乡品四、五品者，可以从八、九品的下士身份起家……要言之，制定了起家的官品大概比乡品低四等，当起家官品晋升四等时，官品与乡品等级一致的原则。然而，在实施过程中，想来会允许在上下浮动一个品级的范围内酌情调整。”^{[8](71-72)}如前所述，从事中郎绝大多数七品官起家，对应三品乡品应是确凿无疑的；个别六、八品官起家的特例亦在此基准合理的浮动范围内。反过来说，假设他们的乡品按规定为三品，起家基准是七品，则乡品与起家官品确实相差四级，足可证成宫崎氏的上述论断，澄清学界的种种误解。综合正、反两方面推理，从事中郎乡品三品的身份资格还是信实可靠的。

其次，社会学方法论给予重要启示，曾祖以降三代官爵履历是衡量阶级循环流动的最佳指标。此法嫁接到中古官制研究，旨在超越乡品环节直接锁定任职者的出身等第，进而昭示阀阅流品社会体制内身份再复制之世袭性原理。就从事中郎而言，梳理其官资背景，再与乡品三品的特定身份相结合，便能打开透视魏晋门阀秩序内部态势的切口。文末表1收录的72人中，69人的家世系谱清晰明确，具有充分的说服力。兹统计他们三代以内的官爵资品，依代数求取世资均值，再按前述族门层级对号入座。世资均值五品以上的士族53例，占比77%；世资均值六、七品的寒士10例，占比14%；世资均值八、九品

及以下的寒人6例,占比9%。可见,魏晋从事中郎,这种接近权力高层的优质职位,并未如想象那般被士族垄断,寒素也有担任的机会,只是概率较低而已。这表明当时阶级对流的大门徐徐掩上,但仍给下层跃升留存了一丝难得的缝隙。

最后,问题切换到乡品层面。学界的基本共识是,乡品数虽有九,却只分上品和下品,曹魏至西晋前期,三品尚在士族上品行列,西晋后期和东晋则坠入下品^[15]。宫崎市定援引《晋书·陈颙传》所载“河北白壤膏粱,何故少人士,每以三品为中正”,甚至提出中正评议上品为杜绝误判、确保公平,“不会给予二品以上的乡品,基本都控制在三品。”^{[8](116)}我们以从事中郎为媒介,发现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表1所举乡品三品的从事中郎,并非都是士族,还包括寒士和寒人;士族内部一流和一般高门并存。仍以司马睿主政东南为界,此前的江右时代,世资均值一至三品之一流高门13人,四、五品之一般高门15人,六、七品之次门5人,八、九品及以下之役门4人;此后的江左时代,世资均值一至三品之一流高门9人,四、五品之一般高门16人,六、七品之次门5人,八、九品及以下之役门2人。所以,实难断定乡品三品究竟是上品还是下品,也看不出西晋后期和东晋明显跌落的痕迹。与其非此即彼的纠结,毋宁视乡品三品为前固化时期汇聚各阶层的过渡带和缓冲区。由此可见,中正铨量的乡品与核算世资的门等虽有关联,却并不完全一致,高品未必皆高门。归根结底,门等取决于先世的官爵资集,乡品则是折中德才簿伐作出的综合评价,中正除固定的世资外,发挥个人意见的余地还相当大。魏晋虽然迈向门阀社会,但清议乡论的传统余威尚存,不可能像南北朝那样一切唯门第是从,故从事中郎混杂各阶层的乡品三品者,而不被士族独占。日后,伴随门阀社会的固化定型,阶级对流的通道彻底阻绝,家世系谱成为铨叙的唯一凭据,中正的评议权无从施展,门等才正式取代乡品径直与仕进对接。宫崎市定指出,东晋以后乡品贬值,士族一律授予二品乡品,竞争的焦点由乡品高下转向匹配门第更为有利的起家职位^{[8](156)}。此变化正是阶层固化日

益严重的客观表征。

四、魏晋公府从事中郎的仕途迁转

中古官制研究的重要经验之一,是不能只关注官职的品秩班阶,衡量其实际效力,还要看清浊、散实、要闲、央地等约定俗成的非制度性元素。它们伴随贵族主义的成长,迎合士族利益诉求、文化旨趣和行为取向产生,并对既有的官僚等级架构产生强烈的扭曲作用,虽无法令明文规定,却潜移默化间左右官员黜陟。这要求我们避免拘泥于职官本身,而应拓宽视野,对临近该职的履历片段进行连续的长程式考察,唯此方能作出更趋精密的判断。前文围绕从事中郎的职权地位和出身资格,初步确定其清要属性,下面将就其仕途迁转展开论述。

王锷先生分析了《北堂书钞》卷六八所引中散大夫山简转从事中郎的事例。他认为:七品中散大夫职务闲散,从官僚行政的角度不会给予太高的官品;从事中郎事务繁杂,从士族的角度审视评价要低于中散大夫,故乡品二品的山简担任从事中郎算作“不拘品位”,否则无须司马伷破例举荐^[16]。但实际上,梳理文末表1发现,从事中郎的迁转履历中决不乏位望通显的各类清要官,出现频率较高的有秘书丞、秘书郎、著作郎、尚书丞、尚书郎、吏部郎、中书侍郎、散骑侍郎、给事黄门侍郎、给事中、奉朝请、廷尉三官、太子中庶子、太子庶子、太子中舍人、太子舍人、太子洗马、步兵校尉、司徒左长史、王文学、公府掾、公府司马、咨议参军、国子博士等。这些官职的声望效力无疑都在中散大夫之上。阎步克先生考证,中散大夫在七品官中与太子洗马并称“清选”,乡品必为二品^{[17](356)}。那么,品质更优的上举诸官,供职者的乡品又岂能低于二品。因此,乡品二品的官职在迁转上与乡品三品的从事中郎是可以对接的,像山简这样的二品人士就任从事中郎便毫无障碍了。易言之,山简出任从事中郎绝非屈尊就卑,而是官场常态。旁证还有,王澄“少历显位,累迁成都王颖从事中郎”^{[3](1239)};王稜“少历清官,渡江,为元帝丞相从事中

郎”^{[3](2012)}。如此说来，司马铄上表只是挑选僚佐履行一般性的启请程序而已，即将辟除对象呈报皇帝诏准，问题的症结不在于候选人山简与从事中郎乡品资格的差异。《北堂书钞》所书“不拘品位”的标题，显系作者不明就里的主观臆测，给后世研究造成误导。

诚然，贵族流品主义讲求根据家世门第分派角色、规划前程，使不同阶层出身者各居其位、各司其职、各安其命、各得其所，以达到泾渭分明、互不侵扰之和諧状态。理论上，每项官职、每条仕进通道、每种晋升方式都是与特定门第紧密搭配的。然而，这只能出现在门阀制度成熟稳固、对流大门彻底关闭的南北朝时期。梁武帝和北魏孝文帝不约而同地切割九品官品，区分士族的流内品、寒士的流外品和寒人的勋品蕴位，将流品原则发挥到极致。而在阶级关系并未完全僵化、跃升空间一息尚存的魏晋，既然评议乡品还不完全拘泥门第，上品还可兼容士庶，三品从事中郎又为何不能在升迁顺序上与二品清要衔接？客观地讲，从事中郎本身就具备清要的特质，起初限定乡品三品，久居二品清要序列而产生同等的效力，日后便顺理成章地升格为二品。不妨大胆猜测，《北堂书钞》引山简事例载从事中郎用第二品抑或第三品可能都对，只是依据的文献版本不同而已。

还有个问题值得注意，我们对魏晋从事中郎的履历末段进行考察，发现仕至三品官是普遍现象，72 人中有 50 人做到三品官以上，占比接近七成。余下多因早逝、罢黜、归隐造成仕途意外中断，其在正常情况下晋升三品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联系从事中郎乡品三品的身份资格，启迪我们思考乡品对仕途前景的预期功能。宫崎市定认为乡品是中正对士人前程的提前预判，其数值在很大程度上源自父辈现居官品的等量置换，几品官之子就授予几品乡品，且意味着未来具备担任几品官的潜质，旨在实现生物遗传性同权利继承性之间的啮合，这样一来，三品官注定成为从事中郎的世资背景和仕宦终点，如果继续晋升则要提请中正更改乡品了^{[8](74,81)}。张旭华先生质疑乡品对官品的终极预期，指出二品乡品的门阀子弟多数人终其一生也难以跻身二品高位^{[18](13)}。但

照此逻辑，又该如何解释乡品三品的从事中郎多仕至三品的事实呢？越智重明原则上赞同宫崎氏的观点，但提出新的对应方法，即乡品一、二品的甲族，最高可升至一品官；乡品三至五品的次门，最高可升至五品官；乡品六至九品的役门，最高可升至相当于七品的二品勋位^{[19](175)}。从事中郎的事例证明，乡品三品的仕宦终点不是五品而是三品。既然乡品三品准许仕至三品官，那么乡品一、二品的仕宦终点就该重新考虑了。倘若以此类推，接受宫崎氏的观点，即乡品一品终至一品官、乡品二品终至二品官，固然合乎逻辑，但尚须大量案例的累积证成，切莫草率下定结论。

五、余论：从事中郎折射门资与乡品的差异

不难发现，本文并非专门的职官考证，而是以从事中郎为媒介，在阅阅流品秩序下探寻门资与乡品的关系。这也是困扰中古史学界的难题之一。陈长琦先生在此方面贡献卓著，他穿越“乡论”的迷雾，强调“门第世资”的决定作用，无疑是正确的，但并未对“乡品”与“资品”进行有效区分，只是为避免误解而在称谓上用后者替代前者，研究过程中还是把乡品当资品来用，特别是在技术操作环节没有触及门资的统计核算与层级划分这一关键要素^[20]。实际上，中古文献明确记载某人具体乡品的材料极其罕见，学者只能借助仕宦、婚媾、社交等特征间接推测，以确保研究的顺利开展，这也是聊且胜无的权宜之计。我们不妨另辟蹊径，充分利用从事中郎这样明确规定乡品资格的珍贵素材，对任职者的家世系谱详加搜集整理，再联系其迁转履历，问题便迎刃而解。本文得出的结论如下：

首先，从事中郎委任乡品三品之人是重要基准，但其阅阅等第差距悬殊，既有世资五品以上的高门士族，也有世资六、七品的寒门小姓，甚至有世资八、九品以下的役门庶民；士族内部也是世资三品以上的一流高门与世资四、五品的一般高门参半。同一乡品门资各异，表明乡品与门品(或资品)是截然不同的两套序列。门第完全取决于阅阅世资，乡品评议除参考门品之外，还要

考察个人素养，故常与门品等级产生偏差。特别是在阶级结构尚未凝固的魏晋时期，选贤与能的信条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影响，与仕进径直对接的就是乡品而非门品。一俟门第壁垒固化成型，乡品便会排除主观判断而与门品重叠，这时再不必纠结乡品，而把阀阅世资同仕途直接挂钩，便可找寻特定的对应关系了。

其次，乡品三品在整个曹魏、两晋，都是以士族为主、适度兼容士庶的过渡区间，无所谓上品抑或下品的差别变动。因此，从事中郎在升迁线路上可与士族独占的二品清要无缝衔接。那么，乡品二品的山简就任从事中郎就不存在任何制度性的障碍了。因此，《北堂书钞》关于从事中郎宜用几品之人的规定，或许只是朝廷统筹把握的大致标准。若以门资置换乡品，从事中郎的

选任还是倾向世资五品以上的士族子弟，适度提拔门第寒劣的优秀人才作为补充。归根结底，基于父祖官爵权势的阀阅等第才是左右仕进的决定因素。

最后，魏晋是乡品主导仕进的时代，乡品对未来仕途前景施加等量等位的预期，几品乡品就意味着获准最终官至几品的资格。因此，魏晋从事中郎普遍能够仕至三品。日后门品支配仕宦的时代，士族按照阀阅世资系统整合“门地二品”，划分世资三品以上和四、五品两大层级，前者准许跨越三品公卿线，后者准许跨越五品大夫线，各自通过整体的区域对位而非精确的定点对位来实现门资资格的反复再造^[21]。这种仕宦终点设定之差异也是士族制度发展不同阶段的显著标志。

表1 魏晋公府从事中郎一览表

姓名	幕府	府主	阀阅世资	起家官	历任清职	仕途末端	授任	史料出处
郑冲	大将军府	曹爽	寒微	七品王文学	尚书郎	三品散骑常侍	引	991/33
羊祜	相国府	司马昭	祖、父五品	七品大将军掾	中书侍郎、给事中	三品中领军	拜	1013/34
荀勖	骠骑、大将军府	司马昭	曾一品、祖四品	七品大将军掾	中书侍郎、廷尉正	三品侍中	转	1152/39
荀绰	司空府	荀藩	祖一品、父三品			六品从事中郎		1158/39
荀邃	丞相府	司马睿	祖、父一品	七品相国掾	太子洗马、中舍人	三品散骑常侍	召	1158/39
荀组	司徒府	王浑	曾四品、父一品	七品司徒属	太子舍人、中庶子	三品侍中	请	1159/39
李憺	大将军府	司马师	父三品	七品太傅掾	大将军司马	三品司隶校尉	命	1188/41
王濬	车骑府	羊祜	世代五品	七品征南参军		三品大司农	转	1207/42
山涛	骠骑、大将军府	王昶、司马昭	父七品	八品郎中	尚书吏部郎	三品侍中	转	1224/43
王澄	大将军府	司马颖	祖四品、父三品		少历显位	二品持节都督	迁	1239/43
郭舒	大将军府	王敦		七品领军校尉	尚书丞	四品刺史	转	1242/43
郑袤	大将军府	司马懿	父四品	七品侯文学	司空掾、尚书丞郎	三品散骑常侍	补	1249/44
李胤	大将军府	司马昭	祖五品	七品镇北参军	尚书吏部郎	三品河南尹	引	1253/44
卢钦	太傅府	司马懿	祖三品、父一品	七品大将军掾	尚书郎	三品散骑常侍	辟	1255/44
卢湛	司空府	刘琨	曾一品，父、祖三品	七品太尉掾	散骑侍郎	五品中书侍郎	转	1259/44
崔悦	司空府	刘琨	曾一品			六品从事中郎		1259/44
华峤	车骑府		祖一品、父三品	七品大将军掾	尚书郎、太子中庶子	三品散骑常侍	转	1263/44
武陔	大将军府	司马师	父三品			三品司隶校尉	引	1284/45

续表 1

姓名	幕府	府主	阀阅世资	起家官	历任清职	仕途末端	授任	史料出处
傅敷	镇东府	司马睿	曾五品、祖三品、父四品	七品太子舍人	尚书郎	六品从事中郎	引	1330/47
傅宣	骠骑府		祖三品、父一品	七品相国掾	尚书吏部郎、太子中舍人、秘书丞	四品御史中丞	迁	1333/47
阮籍	太傅、大司马、大将军府	司马懿、师、昭	父七品	六品尚书郎	步兵校尉	三品散骑常侍	命	1360/49
阮孚	丞相府	王导	祖、父五品	七品太傅参军	黄门侍郎	三品散骑常侍	转	1364/49
胡毋辅之	太傅府	司马越	父六品	七品太尉掾	尚书郎、司徒左长史、太子中庶子	四品扬武将军	引	1380/49
郤诜	车骑府		父六品	七品议郎	尚书丞郎	四品刺史	转	1443/52
张协	征北大将军府		父五品	七品公府掾	秘书郎、中书侍郎	五品内史	补	1518/55
赵胤	司徒府	王导	父五品			三品冠军将军	引	1566/57
周札	丞相府	司马睿	祖五品、父三品	七品公府参军	王国内史	三品征虏将军	转	1575/58
周抚	大将军、司徒府	王敦、王导	曾、祖五品，父三品	七品丞相掾	王国相	三品征虏将军	命	1582/58
牵秀	司空府	张华	祖五品	七品县令	司空长史	三品冠军将军	迁	1635/60
索琳	太尉府	司马模	祖五品、父三品	八品郎中	黄门侍郎	三品安西将军	转	1650/60
周嵩	大将军府	王敦	祖、父三品	七品丞相参军	奉朝请	六品从事中郎	用	1659/61
刘琨	相国府	司马伦	祖、父三品	七品太尉掾	著作郎、尚书郎	三品冠军将军	转	1679/62
祖逖	镇北大将军府	司马炽	世代五品	七品大司马掾	太子中舍人	三品镇西将军	迁	1694/62
祖纳	平北府	王乂	世代五品		尚书郎、太子中庶子	三品中护军	辟	1698/62
温峤	大将军府	刘琨	父五品	七品司徒祭酒	散骑郎、太子中庶子	三品侍中		1785/67
顾荣	丞相府	司马颖	祖一品、父五品	八品郎中	中书郎、太子中庶子	三品侍中	转	1812/68
刘隗	丞相府	司马睿	父七品	六品秘书郎		三品侍中	辟	1835/69
卞壺	丞相府	司马睿	祖五品、父三品	六品著作郎	太子中庶子	三品散骑常侍	召	1867/70
钟雅	大将军府	王敦	父七品	七品县令	佐著作郎、散骑侍郎	三品侍中	请	1877/70

续表 2

姓名	幕府	府主	阀阅世资	起家官	历任清职	仕途末端	授任	史料出处
孙惠	司空府	司马越	曾五品	七品大司马掾	散骑郎、太子中庶子	三品秘书监	请	1884/71
熊远	丞相府	司马睿	祖苍头家奴	七品监军司马	太子中庶子、尚书丞	三品散骑常侍	转	1886/71
庾翼	太尉府	陶侃	父四品	七品太尉参军		三品辅国将军	迁	1932/73
桓豁	抚军大将军府	司马昱	祖八品、父三品	七品司徒掾属	秘书郎、吏部郎	三品右将军	召	1941/74
王承	司空、镇东府	司马睿	祖一品、父五品	七品骠骑参军	尚书郎	六品从事中郎	迁	1960/75
王坦之	抚军大将军府	司马昱	曾、祖五品，父三品	七品抚军掾		三品散骑常侍	迁	1964/75
王稜	丞相府	司马睿	祖、父三品		少历清官	四品广武将军		2012/76
顾众	大将军府	王敦	父四品	七品镇东参军	尚书郎、太子中庶子	三品丹阳尹	请	2016/76
张闾	丞相府	司马睿	曾一品	七品安东参军	给事黄门侍郎	三品侍中	转	2018/76
蔡克	车骑府	司马腾	祖三品、父五品	七品大将军掾	丞相东曹掾	六品从事中郎		2033/77
蔡谟	大将军府	王敦	曾三品、祖五品、父六品	七品东中郎将参军	丞相掾、中书侍郎、司徒左长史	三品侍中		2034/77
诸葛恢	镇东府	司马睿	祖、父一品	七品县令	尚书郎	三品中书令	迁	2042/77
陶回	司徒府	王导	祖四品、父五品	七品公府参军	司徒司马	三品中护军	引	2065/78
谢万	抚军大将军府	司马昱	父三品	七品司徒掾		三品散骑常侍	召	2086/79
毛泰	太傅府	司马道子	祖、父三品		后军咨议参军	三品冠军将军		2128/81
邓岳	大将军、司徒府	王敦、王导		七品大将军参军		三品征虏将军	命	2131/81
王长文	丞相府	司马彤	寒人文学之士	七品县令		六品从事中郎	引	2139/82
孙盛	征西大将军府	桓温	祖、父五品	六品佐著作郎	咨议参军、廷尉正	三品秘书监	迁	2148/82
袁耽	司徒府	王导	祖五品、父三品	七品司徒参军		六品从事中郎		2170/83
江灌	抚军大将军府	司马昱	曾五品、祖七品、父六品	七品司徒属	尚书吏部郎	三品侍中	引	2176/83
张茂	丞相府	司马保	祖七品、父三品		散骑侍郎	三品侍中	辟	2231/86
嵇含	抚军、征南府	司马炽、虓	祖四品、父七品	七品王府掾属	尚书郎、中书侍郎、太子中庶子	四品振威将军		2302/89
续咸	大将军府	刘琨	寒人儒生		廷尉平	六品从事中郎		2355/91
范辑	大将军府		寒人儒生		国子博士	六品从事中郎		2360/91

续表 3

姓名	幕府	府主	阀阅世资	起家官	历任清职	仕途末端	授任	史料出处
邹湛	征南大将军府	羊祜	父三品	七品通事郎	廷尉平、太子中庶子	三品散骑常侍	转	2380/92
枣据	太尉府	贾充	父五品	七品大将军掾	尚书丞郎、黄门侍郎	五品太子庶子	请	2381/92
庾阐	司空府	郗鉴	祖六品	七品太宰掾	尚书郎、散骑侍郎	五品给事中	请	2385/92
曹毗	镇军大将军府		父四品	八品郎中	佐著作郎、尚书郎	三品光禄勋	迁	2387/92
郭澄之	相国府	刘裕			尚书郎、王国相	六品从事中郎		2406/92
褚裒	司徒府	王导	祖三品、父五品	七品王掾属	王文学、黄门侍郎	三品侍中	迁	2415/93
范粲	太师府	司马懿	祖八品	七品太尉属	尚书郎	三品侍中	转	2431/94
孟嘉	征西大将军府	桓温	曾一品	七品征西参军		六品征西长史	转	2581/98
祖约	丞相府	司马睿	世代五品	七品县令		三品侍中	转	2626/100

注：所列资料俱出自《晋书》中华书局 1974 年校点本。“史料出处”一栏，间隔符前面的数字代表页码，后面的数字代表卷数。

注释：

- ① 经典论述见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韩昇、刘建英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 年，第 81 页；唐长孺：《九品中正制度试释》，《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北京：中华书局，2011 年，第 109 页；祝总斌：《试论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制度》，《材不材斋史学丛稿》，北京：中华书局，2009 年，第 161 页；胡宝国：《九品中正制杂考》，《将无同——中古史研究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20 年，第 112 页；阎步克：《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9 年，第 355 页；王铨：《山简乡品考——以〈北堂书钞〉版本异文为线索》，《中国史研究》2005 年第 3 期，第 47-55 页；李济沧：《六朝贵族的自律性问题——以九品官人法中乡品与官品、官职的对应关系为中心》，《文史哲》2016 年第 4 期，第 66-76 页。其他优秀作品若有遗漏，敬请谅解指正。
- ② 《宋书》卷三九《百官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第 1224 页。另据《南齐书》卷十六《百官志》载，唯四镇将军以上加大者，方授开府仪同三司为位从公，获准专设从事中郎，但未强调是否领兵（北京：中华书局，1972 年，第 313-314 页）。反映的可能是南朝初年的新变化。
- ③ 北魏把加授开府仪同三司的资格下限设定为中军、镇军、抚军、四镇将军和光禄大夫（参见张鹤泉：《论北魏时期的开府仪同三司》，《魏晋南北朝史论稿》，长春：长春出版社，2022 年，第 152-175 页），北魏典章摹仿

魏晋南朝，据此反观，可知《宋书》所载较《晋书》更妥。

- ④ 《晋书》卷三九《荀勖传》载，荀勖参大将军军事，授从事中郎（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第 1152 页）。足证，“参某军事”等同“从事”，未必固定指“参军”职务。
- ⑤ 张鹤泉：《东汉故吏问题试探》，《秦汉史论稿》，长春：长春出版社，2023 年，第 83-94 页。君臣之义蕴含的人身依附关系突出体现在故吏为府主伸冤昭雪上。《晋书》卷六二《刘琨传》载，刘琨被段匹磾杀害，东晋忌憚段部势力，未给刘琨举哀发丧，故从事中郎卢谿、崔悦上表陈述原委，使刘琨得享吊祭（第 1687 页）。
- ⑥ 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年，第 146 页；刘军：《论北魏士族的门第等级以释褐为中心的考察》，《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4 期，第 183-189 页。三品涵盖公卿，五品象征大夫，各自对应不同的身份层级，甄别门第以三、五品划界乃当时的积习惯例。
- ⑦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8 年影印清光绪十四年（1888）南海孔广陶本录此段文字：“从事中郎缺，用第二品。中散大夫河南山简，清粹履正，才职通济，品仪第三。”（第 279 页）正文中的引文出自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58 年，第 1548 页），唐长孺与宫崎市定先生的论著便以此为准。王铨先生结合版本考异和制度研究，提出从事中郎应用乡品三品，而山简乡品为二品的结论，参见氏著《山简乡品考——以〈北堂书钞〉版本异文为线索》，《中国史研究》2005 年第 3 期，第 47-55 页。笔者经反复斟酌，暂遵从王氏之说。

参考文献:

- [1] 廖伯源. 历史与制度——汉代政治制度试释[M].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 1998.
- [2] 范晔. 后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 [3] 房玄龄. 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4] 陈奕玲. 考议魏晋南北朝的将军开府问题[J]. 西安教育学院学报, 1999(2): 54-57.
- [5] 王先谦. 汉书补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6] 增渊龙夫. 中国古代的社会与国家[M]. 吕静, 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7.
- [7] 赵超. 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M]. 北京: 中华书局, 2021.
- [8] 宫崎市定. 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M]. 韩昇, 刘建英,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0.
- [9] 沈约. 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10] 魏收. 魏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11] 虞世南. 北堂书钞[M].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8.
- [12] 蒙思明. 魏晋南北朝的社会[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 [13] 唐长孺.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 [14] 胡宝国. 将无同——中古史研究论文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2020.
- [15] 杨恩玉. 魏晋九品官人法之上品的演变与起家官制度[J]. 社会科学, 2020(2): 160-170.
- [16] 王铿. 山简乡品考——以《北堂书钞》版本异文为线索[J]. 中国史研究, 2005(3): 47-55.
- [17] 阎步克. 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 [18] 张旭华. 九品中正制略论稿[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4.
- [19] 川合安. 南朝贵族制研究[M]. 柴栋, 译.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2.
- [20] 陈长琦. 魏晋南朝的资品与官品[J]. 历史研究, 1990(6): 39-50.
- [21] 刘军. 北朝挽郎选拔与士族激励机制新论[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5): 202-210.

On the assistant Zhonglang in the shogunate office during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LIU Jun

(Research Institute of Ancient Documents,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the military shogunate of the feudal lords and their subordinate lords specifically set up the position of Zhonglang. It is no longer a private vassal of the emperor who oversees the army, but a trusted confidant of the prefect, maintaining a close vassal relationship with the superior. His position is between that of a chief official, a chief minister, and a military and civil servant. As a senior administrative assistant, he has the authority to inquire about the affairs of the shogunate, including consultation, intelligence, personnel, command, and constitutional affairs, and can fully represent the head of the shogunate in handling affairs. And he is a prominent official in the shogunate's discipline. The selection qualifications for the position of Zhonglang are in line with the fixed combination of the third grade of rural evaluation, with a focus on high class aristocrats from prestigious family backgrounds, but also with integration with excellent individuals from the poor. His official career includes several important positions for the second grade, and it is customary for the promotion process to be interconnected, which reflects that although the curtain of power had already been opened at that time, the convection channels had not yet been completely closed. At the end of his career as a middle ranking official, he generally rises to the rank of third rank official, which proves that the rural rank has an equal expectation function for the prospects of officialdom. The subjective evaluation of rural evaluation level by Zhongzheng is different from those solely based on the calculation of hereditary assets, which must be carefully distinguished in the study of Zhonglang and other officials.

Key Words: Wei and Jin dynasties; the shogunate; assistant Zhonglang; rank system; prestigious family background; rural evaluation level

[编辑: 苏慧]